

治政寶典

文 白对照《贞观政要》全译

[唐] 吴兢撰 洪彝等译 韩兆琦审定



群众出版社

治政寶典

文白对照《贞观政要》全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唐] 吴兢 撰

陈洪 孟向 荣
黄岳 马维 纲
郝大 陈洪 新

韩兆琦

审定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姚 健

治政宝典——文白对照《贞观政要》金译
〔唐〕吴兢撰 韩兆琦 审定 陈洪宜等编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40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170-0/K·31 定价:12.00 元

印数:0001-8000 册

前 言

《贞观政要》一书,是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吴兢编著的。吴兢(670~749),生活于唐前期,历经唐高宗、中宗、武后、睿宗及玄宗数朝,在武后当政的晚年进入朝廷史馆,参与编修国史,与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一道,撰成《则天实录》,自己写成《唐书》《唐春秋》等书,行文直笔无讳,叙事简洁,赢得“今董狐”、“有古良史之风”的盛誉。他活了80多岁。40岁之后,适逢唐代历史上所艳称的“开元盛世”,所谓“开元全盛日”(杜甫语)正是诗人所讴歌的时期;而作为历史学家的吴兢,则敏锐地看到了繁荣鼎盛局面背后隐伏着的政治危机与社会病痛,他希望当局能予以重视并引起救治的警觉。(吴兢死后6年便爆发了安史之乱)他认为:唐代建国以来,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策法令、政风民风,是最好的,“良可足观”(见本书自序,下同)而当前政治则颇多可虑之处;他说:“有国有家者”只要守住贞观之治,就可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哉!”他十分重视太宗朝的“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其中,“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对后世有着永久的教育鉴戒作用。于是,他把贞观年间太宗皇帝与名臣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李靖、马周等人的议政问答之词,谏诤奏议之语,凡有关军国大政者,不论当时实行与否,一律分门别类,按时间先后加以纂辑,涉及君道、政体、求谏、择官、务农、用刑、征伐、守边、节俭、悔过以及子弟教

育,文史礼乐与宫廷秩序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共成十卷四十篇文章,题为《贞观政要》。书成以后,进献给了唐玄宗,得到好评。他本人也由谏议大夫而改任太子左庶子,负责太子宫的管理事宜。

长期以来,《贞观政要》一书,一直被视为论政宝典,被历代王朝规定为“储君”(皇太子)的必修课,有专人讲授。连日本皇室也将其列为从政必览的经典,传世传习。同时此书对唐初政权建设、政治方略、重要政治设施的记载很详时,揭示了一些重要制度的形成与贯彻的具体过程,这就为我们研究有唐一代的社会政治状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我们知道,汉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唐都长安是当时东方文化的中心,唐太宗本人也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推尊为“天可汗”——国际领袖。李世民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和他身边的大臣所组成的政治核心,这个核心的丰富的政治智慧,在创建唐代文明的事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经验与哲理性的认识,比如“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君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体》《教诫太子诸王》等篇),“草创难,守成更难。”(《君道》《慎终》等篇),“何代无才”,圣人之治“不借才于异代”(《择官》《仁义》等篇),“人(民)无常俗,政有治乱”,“因人(民)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仁义》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任贤》)“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务农》)“国家兴旺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奢纵》篇),“死者不可复生,用刑务在宽简”(《刑法》篇),“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征战》篇),以及“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慎终》篇)等等,所包涵的政治哲理,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历久弥新之感。应该说,在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之后,这本论政宝典,对于

开发我们的政治智慧,对于搞好我们今天的工作,仍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群众出版社组织力量,将本书全文译出,译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整理本为依据,兼取传统版本之所长,吸收前代特别是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撰成,语言顺适流畅,适于阅读。出版社并拟将唐太宗本人所作的《帝范》、魏征的《魏郑公谏录》二书一并配套译出,相继出版,这无疑是一件有益于研究并普及传统文化、有益于开发和继承前人政治智慧的善举。相信它会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当然,书中某些译得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也会得到专家同仁与广大读者的教正——这自然也是对本书、对译者的爱护。

书将付印,略陈数语,是为序。

韩兆琦

1993. 6. 15

贞观政要序

吴兢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译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原序译文

我大唐名相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正两位大人，认为时逢圣明之主，位居宰相之职，恢宏帝王之道，辅助王家朝政，是自己的天职。他们唯恐一物失所，一事有误，担心忠孝仁义之道不能贯彻下去，总是克己奉公，励精图治。他们缅怀历史的名人事迹，从来不肯懈怠。一致认为：太宗皇帝在位时的政策教化，十分值得借鉴，是亘古以来所没有的宝贵经验。至于当时垂世立教的美政，典谟谏议的词章，凡可以发挥弘扬大道者，凡可以增益崇奉至德者，二位宰相都让我这个识见寡陋之人一一加以拣选抄录。其体制大略，均发自成规，不敢随意改篡。于是，我便采拾搜集以前的所见所闻，再以旧有史书相印证、相参照，筛选其精华，明确其大纲，行文质朴而稍具文彩，主旨在于垂诚于未来。所收文辞，人伦纲纪皆在其中，军国要略无所缺漏。共一匣十卷，合计四十篇，题其名为《贞观政要》。此书编成，只望有国有家者因此而能找到前进的榜样与目标，择其善者而从之，那么，本来长久的帝王事业可以更加光辉灿烂，本来巨大的功勋可以更为广播四海，哪里非得要言必称尧舜，事必效汤武呢？

其篇目次第就开列于下。

目 录

前 言	韩兆琦 5
原序	吴 兢 8
原序译文	9
一、君道〔论为君之道〕	1
二、政体〔论基本政治原则〕	14
三、任贤〔记贞观贤才〕	32
四、求谏〔论征求批评〕	55
五、纳谏〔评〕附录：直谏	66
六、君臣鉴戒〔论君臣鉴戒〕	97
七、择官〔论选才任官〕	111
八、封建〔论封王建藩〕	127
九、太子诸王定分〔太子和诸王的名分与地位〕	142
十、尊敬师傅〔论尊师〕	147
十一、教戒太子诸王〔对太子诸王的教诲〕	156
十二、规谏太子〔对太子的规劝〕	167
十三、仁义〔论行仁政〕	189
十四、忠义〔记忠义之士〕	192
十五、孝友〔论孝敬与友爱〕	205
十六、公平〔论公平〕	208
十七、诚信〔论诚实守信〕	233

十八、俭约〔论俭朴〕	241
十九、谦让〔论谦让〕	249
二十、仁惻〔论关怀民生〕	253
二十一、慎所好〔谨慎个人爱好〕	256
二十二、慎言语〔谨慎言语〕	260
二十三、杜谗邪〔论杜绝谗言〕	264
二十四、悔过〔论悔过〕	271
二十五、奢纵〔论奢侈纵欲〕	274
二十六、贪鄙〔论贪婪鄙陋〕	280
二十七、崇儒学〔论尊崇儒学〕	286
二十八、文史〔论文学与史学〕	294
二十九、礼乐〔论礼乐教化〕	298
三十、务农〔论重视农业〕	314
三十一、刑法〔论法制〕	318
三十二、赦令〔论赦免〕	333
三十三、贡赋〔论进贡与税收〕	336
三十四、辩兴亡〔论王朝兴亡〕	340
三十五、征伐〔论征讨叛逆与敌国〕	344
三十六、安边〔论安边方略〕	363
三十七、行幸〔论帝王出游〕	371
三十八、畋猎〔谈帝王狩猎〕	378
三十九、灾祥〔论灾异与祥瑞〕	384
四十、慎终〔论执政的善始善终〕	392

附 录

一、唐高祖太宗朝大事记	407
-------------	-----

二、唐贞观职官表(摘要)	418
〈一〉唐贞观年间朝廷职官表	418
〈二〉唐初太子府职官表	432
〈三〉唐代地方职官表	433
唐初割据形势图	434
唐代疆域图	435
编译说明	436

一、君 道

〔论为君之道〕

贞观(627~649)初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作为君王的基本点,必须首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倘若损伤老百姓来奉养自己,那就如同割了大腿肉来喂肚子;肚子饱了,身体也就完了。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己。世上从来没有身子正而影子歪,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混乱的事。我常常想,伤害君王之身的不在外物,全在那不知满足的嗜好与贪欲,是这种嗜欲促成了帝王杀身亡国的大祸。一个帝王,如果沉溺于美味佳肴,声色狗马,所贪求的既多,所损害的也就大;既妨害了国家政事,又侵扰了全国百姓,还有,帝王说出一句非礼的话,民众们就会散心;怨恨诽谤一旦产生,叛离之事也就会接踵而来。我这个皇帝常常想到这一点,不敢丝毫放纵自己。”谏议大夫魏征回答说:“古代圣哲明智的君王,也都是从切身情况出发,推己及物,所以能广泛地体察物情,治好国家。当年楚庄王礼请贤士詹何,向他询问治国的要领。詹何就拿如何修养身心来作答,楚庄王又问他治国的要领到底是什么,詹何就说:‘没听说过君王自身修养好了,而国家会动荡混乱的’。皇上您所讲这个道理,的确跟古人讲的义理是一致的。”

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魏征说：“什么叫明君？什么是暗君？”魏征说：“一个君主，他之所以能明达，是因为能兼听多方面的意见，把握多方面的情况；之所以昏蒙，是因为偏听偏信单方面的意见，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诗经·板》篇里唱道：‘先人留下一句教导：征求意见可不要把樵夫忘掉！’当年尧舜的治理国家，打开四方之门来接纳八方人士，开通四方视听来了解天下事理，所以能够做到圣明的目光无所不照察，而淫辟的共工与误事的鲧也就不能蒙蔽视听了，那些言辞中听而行为不轨的人也就无法混淆是非了。秦二世胡亥把自己深深地隐藏于深宫之中，捐弃隔离所有自己不亲近的人士而偏信于权奸赵高，及至天下已经崩溃离叛，他还一点信息都不知道呢！梁武帝萧衍，偏信朱异招降纳叛的鬼注意，结果军阀侯景发动叛乱，叛军已打到京城，梁武帝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谎报的军情，而各地兴兵举事者攻城破邑，他却一点也无法知道。这样看来，人君要兼听，要容纳臣下的不同意见。那样，亲贵宠幸的臣子也就不能堵塞耳目，蒙蔽真情，而下情也就能够上达了。”太宗十分赞赏魏征的这番议论。

贞观十年(636)。太宗向身边的大臣们问道：“帝王们的统一大业，草创与守成相比，哪一件更艰难些呢？”官任尚书左仆射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动乱，时局昏暗的时期，群雄并起，竞相争夺。你只有攻破了他他才会投降，歼灭了他他才会服输。由此说来，草创是最艰难的。”魏征回答说：“帝王兴起的时期，必定相承于世道丧乱衰败的时机。推翻那种黑暗奸诈的统治，百姓会真心实意地给以拥戴，四海之内各种力量也会归向于圣明。有上天的赐予又有下民的应从，草创是并不困难的。然而，既得天下之后，就会志得意满而骄横纵逸起来。百姓希望有个喘息机会来休养

生息，而兵役徭役却无时休止；百姓凋零残破生计无着，而帝王对奢侈淫逸的追求却不会收敛。国家的衰败，总是从这里开始的。据此而言，守成实在不容易。”太宗说：“房玄龄早年就跟随我打天下，东征西讨，备尝艰辛，且万死而遇一生，所以他了解草创基业的艰难。魏征与我治理天下，担心出现骄奢纵逸的苗头，最后势必走上危亡的境地，所以他看到了守成的艰难。现在，基业草创的艰难已经过去了；守成的艰难之处，我将与诸位大臣谨慎从事！”

贞观十一年(637)。位在特进的魏征给皇帝上书说：

“臣子我观察自古以来接受天命，担当创业重任的帝王，与继承伟业，致力于巩固政权的君主，都驾驭着天下英豪，高坐在宝座上统治万民，谁都希望自己的德行能与天地同厚，自己的光荣能与日月争辉，皇家的大位能百代相传，以至于万世无穷。然而，能够善终的极少极少，破败灭亡者则一个接着一个，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他们用来通向目标的道路走错了啊。前代崩亡的镜子离我们并不远，这里可以作一点说明。

当初，隋家统一了天下，兵强士勇，三十余年之间，令行万里，威震海外，却于一个早晨全都拿来抛弃了，尽为他人所有。他隋炀帝难道就讨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希望政权的永远巩固，故意推行桀纣般暴虐的政治，从而自己走上灭亡之路么？他是依仗着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啊！他驱使天下人服从自己的贪欲，耗尽万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搜求天下美女，征集异域珍奇；宫殿园苑只求豪华，楼台亭阁只求高敞，徭役无时暂停，干戈无时稍止。外面表现得庄重严明，内心却藏着险刻猜忌；奸谄邪辟之人必受其福，忠正耿直之臣不保其身；上下相蒙骗，君臣不同心。百姓不堪于役使压榨，全国都陷于离析分崩。于是以其天子

之尊，被戕杀于小人之手，子孙也被消灭干净，为天下人所耻笑，这不是很痛心的吗？

我大唐天子英明圣哲，当机立断，拯救天下于危乱倾覆之中，撑天的八柱倾倒了，能重新扶正过来；系地的四维废绝了，又再次设置起来。域外无事，境内安宁，没有用到一周年的时间；要消除弊害，减轻刑杀，根本不必等待百年之久。而今隋人的宫殿楼台，全都被皇家住上了；奇珍异宝，也全都没收过来了；美貌的嫔妃，都侍奉于您的身边了；四海九州，都已是国家臣民了。如果能够鉴戒于隋朝的之所以灭亡，牢记住我朝的之所以胜利，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即使发展起来了也不要满足于成就。下决心焚毁掉商纣王的鹿台宝衣，拆除掉秦始皇的阿房宫殿；畏惧着高楼广宇、雕墙画壁将葬送政权，从而安心于卑宫小殿，那就会神明化育于天下而自然地政通人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是上等的帝王事业。如果认为已成之功、已造之物不必毁弃，那就保存原有的这些宫室珍宝之类，去掉其中的不急之务，把耗费压缩了再压缩；实在必需兴造时，可以在原有的桂楝玉砌之间，参杂进茅屋土阶，使用民力要让人乐于承担，不去耗尽人力；常常想想自己住在里面所享受的快乐，再想想建造它的人所付出的辛劳。使亿万百姓像为父亲效力一样愉快地来听从使唤，使全国臣民都仰仗着皇上的恩德而得以自由长养；这是次一等的帝王事业。如果唯我圣明而不思其余，不谨慎于事业要善始善终，忘记缔造天下的艰难，自以为有天命可以依恃，忽视保持采椽不斫的恭俭之德，追求画棟雕梁的绮丽奢豪，去拓展秦宫隋殿的基地进而增饰它，又随事添加，不知止足，使万民不见恩德而只知劳役；这就是最差的政治了。这样作的话，好比是背着柴禾去救火，扬起开水来止沸，用暴乱去代替暴乱，这就与昏乱者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后果是不堪预测的。后世子孙又从哪里找到自己的榜样呢？凡

行事不足以垂鉴于将来则百姓怨恨，百姓怨恨则天帝发怒，天帝发怒则灾害发生，灾害发生则祸乱发作，祸乱发作而能保身全名的人就极少极少啦！皇上您顺从天意，革除隋氏而创业以后，将不断发展如同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不朽基业，留给子孙，传续万代。这个天下难得而易失，能不认真思量吗？”

在同一个月中，魏征又上书说：

“我臣子知道：要想树木茂盛地生长，就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子；要想河流长远地流动，就一定要深挖它的源头；要望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积德积义。源头不深而望它能够长流，树根不固而望它茂盛生长，德义不积而望国家治理，我臣子虽然愚笨，也知道是不行的，何况英明圣哲的皇上呢！帝王处于天子的重位，据有四海之内广大的土地，将增进那高入九天的巍巍大业，永保这传之万代的无边福泽。不考虑居安思危，不想着以俭去奢，德行不能积于高厚，感情不能胜过私欲，这好比是砍掉树根来求得树木的茂盛，堵塞源头来谋求水流的长远啊！”

古来的许多多君主，接受天命登上了皇位，没有不是在忧患中显现其圣明的德性，而一旦功成业就，就一步步德衰行败了。有好的开头的帝王很多，而有好的终结的君主就太少了。难道取天下容易而守天下太难么？当初取天下时，德行有余；今朝守天下时，便似乎才力不足了。这是什么原因？原来，处于沉重的忧患之中的，一定是竭诚尽心地接人待物；得志之后，就纵情傲物蔑视一切了。竭诚待人，即使胡人与越人也会连为一体；蔑视别人，那么手足骨肉也会形同路人。纵然你用严刑峻法来督责他，用雷霆之威来震慑他，毕竟只能苟免于一时而不会心怀感激，只能貌似服从而不会心悦诚服。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在于人心。水能浮船，也能翻船的比喻，是应该牢牢记取引以为深戒的。统治天下，就如同手执朽索而驾驭奔马一样，是绝对不能够有一丝

一毫的疏忽大意的！

君临于万民的人，真该做到以下的“十思”：见到可以占有的东西时就想想该用‘知足’来告诫自己；准备有所兴作时就想想该用‘知止’来安宁百姓；知道居高则危就想想应该保持谦和冲淡来自我约束；担心过满则溢就想想大江大海的接纳百川；乐于游猎就想想事不过三的明确限度；害怕松懈怠惰就想想要慎于始而敬于终；要防止壅塞蒙蔽就想想应该虚心听取臣下的谏诤；考虑到奸谗邪辟就想想端正自身来排除奸恶；恩泽所加就想想不能因个人所爱而任意乱赏；刑罚所及就想想不能因私人所恨而滥施惩罚。汇总上述这十个应该想到的方面，发扬光大《尚书》中关于九种德行的倡导，挑选有能力的人才来任用他，择取正确的意见来实行它，那么，智者就能尽其谋，勇者就能尽其力，仁者就能广布其德泽，信者就能贡献其忠诚。武将文臣争着为国家奔走效力，君臣上下都能相安无事，这就可以享受豫逸游玩的真正快乐，就可以保养赤松子、王乔般的仙寿高龄，就可以弹琴作诗，垂衣拱手，而使天下达到至治的化境了。那又何必您皇上亲自劳神苦思，代臣下操持尽责，来奴役自己那既聪又明的耳目，从而亏损‘圣人无为’的治国大道呢？”

太宗看了这两次上书，亲自写了回信说：“认真地看了您几次直言上书，的确尽了您对国家的忠诚恳切之心，话都说得透彻而中肯。披览之下，我简直忘了疲倦，每每看到更深半夜。若不是您先生体察国事的感情深切，关心爱护我的情义深重，怎么会告诉我这么好的长远谋略，怎么会匡正我的失误与救助我的欠缺呢？我听说过，晋武帝从平定孙吴统一中国之后，就一心追求骄纵奢侈，不再留心于治理政事。他的大臣何曾从朝会上回家之后，对自己的儿子何劭说：‘我现在常常发现皇上不讨论治国治世的深谋远略，却只说些日常生活琐事。这可不是足以留给子孙